

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

戴海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上海, 200235)

摘 要: 郑观应以商人的冷静和理性, 着眼于“不宜慕虚名而贾实祸”的现实考虑, 慎重操作了招商局轮船的“换旗”交涉, 并出于政治考量、对“东南互保”局面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多有建言。他参与中国国会, 出于对“勤王”旗帜的认同, 在反义和拳、反排外、反北方政府等问题上有着充分自觉, 对变政维新的前景也抱有强烈愿望, 并通过上书陈情, 付诸于行动。这些事实所蕴含的历史纵深信息, 不仅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言说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也为反思既有史学叙事中新旧对垒、此长彼消的单调认知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关键词: 郑观应; 盛宣怀; 东南互保; 中国国会

发生在上个世纪初年的“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 已有的研究著述大多注意到上海是最初酝酿与发起这一局面的地点, 而当时以督办铁路公司名义居留沪上的盛宣怀(1844—1916)及其周边“上海中外官绅”发挥了很关键的筹画、倡议与推动作用。^① 国内早期的相关研究, 固因时代局限, 不免较重的政治批判色彩, 但也注意到“那些买办出身的官僚和官僚出身的买办”在此事件中有着一一种“特殊的地位”。^② 稍晚的论说则着眼于戊戌以后士绅群体政治意识的分野, 特别强调与洋务派督抚密切合作者所拥有的“帝党”身份。^③ 另有不少论者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持续地展开论证, 指出“东南士绅”及“资本家”群体出于保护地方利益的愿望而强烈要求避战, 进而谓当时以上海为中心已经形成一个“中外绅商的利益共同体”。^④ 时任上海招商总局总办的郑观应(1842—1922), 作为盛宣怀的亲信幕僚在此重要历史时期亦有建言建策, 他在何种层面、多大程度上介入了“东南互保”以及前后时局, 是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 而对此课题的研究, 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先是上世纪90年代, 易惠莉教授在《郑观应评传》中披露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 即“东南互保”前夕郑观应致盛宣怀的一通函札, 认为此函反映出“上海绅商社会对北方事态恶化及南方可能受侵害的担忧”, 但同时指出, “以郑观应当时的地位, 尚不足以令他涉足策动东南互保这样高层的政治外交活动”。^⑤ 2006年, 马勇先生撰写的《中国近代通史》第四卷《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出

* 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2ELS00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上海中外官绅”语取自李国祁的《张之洞的外交政策》, 广义上也可包括江浙地区, 该书谓“上海中外官绅所倡导与各国领事订约的活动, 并非是直接受张之洞联合南方各疆臣通电的影响, 而是几乎同时进行的单独活动。领导此一活动的中心人物是盛宣怀……订约互保与拒阻洋兵入江, 为当时南方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何嗣焜、盛宣怀的主张实在是上海官绅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汪康年、赵凤昌等的共同意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0年, 第151—153页) 其他研究诸说具体的表述不尽相同, 但大致指向仍然是近似的, 如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自保》一文亦谓“所谓订约互保的起始, 最初酝酿地点在上海, 参与的人有盛宣怀、沈瑜庆、汤寿潜、蔡钧、沈曾植、余联沅、何嗣焜、福开森、汪康年、赵凤昌。”(原载《大陆杂志》, 第25卷, 第4—6期, 1962年; 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13·庚子拳乱》,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年) 关于上述“上海中外官绅”在“东南互保”时期具体言行的考证及相关评价, 可参拙文《“上海中外官绅”与“东南互保”——〈庚子拳乱东南互保之纪实〉笺释及“互保”、“迎銮”之辨》, 《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2期。

② 王明中《义和团运动中的英国与“东南互保”》, 《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4期, 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第413页。

③ 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年, 第115页。

④ 谢俊美《“东南互保”再探讨》, 收入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年;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晚清政治》,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 第239—240页。

⑤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589—590页。

版,书内也提到了这一条史料,并据此认为正是“郑观应的提醒启发了盛宣怀”,从而才有“三天后盛宣怀致电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提议‘从权’在上海与各国领事订约互保”。^①稍晚,马先生又发表专文《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据已刊《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卷所收若干郑观应函札,对“东南互保”策动过程有所补充,结论则谓“郑观应不是东南互保事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建言是否发挥作用也并不太清楚”;同文并讨论了郑观应与中国国会的关系,或缘于史料不足,仅能由“思想逻辑”推论,相信他“应该还是比较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②马先生论文较多铺陈了“东南互保”的背景以及郑观应在生平不同历史时期所作“文本”中间体现的政治理念,对于郑观应本人之于“互保”的究竟有何具体作为,则着墨无多,尤令人遗憾者,同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且与郑观应本人关系最为密切的《轮船招商局》卷似未为作者所寓目,而该卷实保存了为数不少的史料,对郑氏其人在“互保”期间的行为动态有着充分反映,颇具参考价值。另外,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未刊档案及近代日语文献中,相关史料也仍留有发掘的空间。本文拟据若干新材料再谈“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尝试在诸位研究先进的成果基础上略作一些补正的工作。

一 “换旗”交涉始末

(一) “换旗”建议的提出

前揭易惠莉著作、马勇论文皆引用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郑观应致盛宣怀函文,以此说明他因应时局的对策。文录下:

敬肃者:昨上存缄,亮邀钧鉴。顷详报载,天津租界已为华兵扫平,殊深焦灼,不但为祸益大,且舍弟翼之及舍伍辈均在天津博文书院读书故也。如有确音,务祈示慰。势似瓜分,恐各国分兵踞地(如京津与西兵大战,恐英踞吴淞炮台,复派兵入长江内地惊扰,不堪设想)。各公司宜早筹备,刻徐雨之来谈,亦拟换旗,已谆嘱各董妥商后(有云“不必换”,有云“宜换旗”)禀请裁示祇遵,敬叩钧安。官应谨上。廿六日。^③

按此函背景为,本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列强海军强行攻取大沽炮台,继而天津清军联合义和团围攻租界,连日激战,故有“为华兵扫平”传闻。郑翼之(1861—1921),郑观应五弟,天津太古洋行买办。所谓“恐英踞吴淞炮台,复派兵入长江内地惊扰”一说,则缘于华北局势恶化之初,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 L. Warren, 1845—1923)奉命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派遣英舰开赴长江各口岸,并保证“在维持秩序时将得到女王陛下的支持”,因被视同“外人窥伺”之野心暴露,而遭到两总督婉拒。^④大沽开战后,英国领事当局又渲染列强攻占吴淞炮台的风险,继续向中方试探“归英代筹”的可能。^⑤徐雨之,即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著名买办,轮船招商局创办初期曾出任会办一职。郑观应晚年有诗《赠徐雨之观察》,“三番共事将卅载,两代相交近百年”一句透露出两人交谊之久之密。^⑥庚子年徐润已因故脱离招商局,据其自订年谱,本月十三日(6月9日),由汉口甫至上海。^⑦

义和团事变骤起后,身负招商局总办之责的郑观应对北方局势一直保持密切的关注。五月十八日,“闻西山避暑之公使馆某公使已被焚毙,日本参赞欲出城,被守城门之兵杀毙”,向盛宣怀陈请应对

① 马勇《中国近代通史·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3页。

② 马勇《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晋阳学刊》2010年第2期。

③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81页。按郑观应又作“郑官应”,本文正文皆统一为“郑观应”,引用文献出注时,则依原文。

④ 《外交部致海军部函电》,1900年6月1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胡滨译,丁名楠、余绳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2—43页;《致江宁刘抚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94页。

⑤ 《江督致鄂督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庚辛史料》,《河北月刊》1935年第3卷第1期。

⑥ 郑观应《赠徐雨之观察》,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23页。

⑦ 徐润《清徐雨之先生润自叙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99页。

之策，谓以“时局愈危，长深太息，我公如有消息，并祈示悉”。^①二十三日，“谣传总税务司被害”，继而稟陈“此言谅不确，如果再有伤害各国大员等情，恐收束更难矣”。^②至二十六日，因迫于“势成瓜分”的现实威胁，加以徐润等人的推动，遂适时地提出了“换旗”建议。马勇先生说“郑观应的这个建议我们从已有文献还看不出盛宣怀有什么回应，只是可以肯定的是，郑观应的这个提醒一定启发了盛宣怀。”郑观应的建言是否为“东南互保”倡议的来源之一，证据链的空档尚待填补，但盛宣怀对“换旗”的具体回应，却可以在既存文献中得到印证，事实并非如马先生所言的，“东南互保达成后，郑观应将中国企业易帜的建议自然不了了之”。

不晚于五月二十三日，郑观应已经就“换旗”事宜与盛宣怀有过协商，当日去函云“昨奉手示，敬悉礼和转旗与众不同，彼抽九五用外，仍要本局派司员在该行办事，既计时不久，似可不必。宁波‘江天’船太古亦求代理，亦婉言辞之。”^③二十五日续函谓“旷观时局，敌国多，人心叵测，美德伦与鄙见不谋而合，均以局船换旗为是。”^④按“礼和”，即德资礼和洋行（Carlowitz & Co），主要业务为代理机械、军火进口。“太古”，即太古洋行，为老牌英资洋行，所属太古轮船公司与轮船招商局有着长期业务竞争关系。美德伦（Mitland），英国人，原供职于汇丰银行，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洋大班（经理）。^⑤郑观应利用与在沪洋商、洋员的关系，通过一系列磋商，很快就“换旗”问题与其达成了共识。在战争期间轮船进行“换旗”操作，被当时人视作“万国通行之公例”^⑥，而在轮船招商局发展历史上，也不乏先例可循。中法战争期间，为免局轮遭击，招商局即一度与美资旗昌洋行密订售产换旗行驶的协定，将航线暂交代为经营，各轮悬挂美国旗后继续运转。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招商局又一次采取了“换旗”措施，而此次负责实际操作者正是郑观应，尽管在招商局内部遭到反对的声音，但他据理力争，取得了盛宣怀的支持，将局船委托德商信义、礼和洋行代理，这也被视为他在招商局会办任上“最有价值的工作”之一。^⑦

到了庚子年，“换旗”说重新被提起，这可以说是郑、盛二人在此问题上的再度合作了。据郑观应函稟，可知盛宣怀对“换旗”建议予以充分认同，至五月二十九日，此事已取得了初步结果：

鼎德、蔚霞、耶松所买之船，明日签字（今日两点钟已到美领事署，因合同有错须改过，故明早签名）。谓礼和所买“公平”、“利运”、“爱仁”三船，据云候其外部回电，船上准不换人方可交易。^⑧按鼎德（Francis P. Knight），美国人，旗昌洋行创办人。蔚霞（Thomas Weir），英国人，招商局洋籍总船主。“耶松”，即耶松船厂（S. C. Farnham & Co.），1865年创办于上海，原由美商经营，后吸纳英国资本，逐渐演变为英商企业，是外国在华的最大船舶修造厂之一。按照原来计划，招商局轮船大致以原进口商为分类标准，分别更换美旗和德旗；至于具体的交涉进度，前者已接近签约，成议在望，后者则因“换旗不换人”的条件（即变更轮船注册国而轮船员工仍予保留）尚待德方确认，暂时悬而未决。

（二）日本的介入和“香港注册”说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5），在听说招商局有“换旗”动向后，亦欲介入。他在中国代表“会议互保”的次日，致盛宣怀函谓：

顷者拜晤，畅领大教，始知贵轮船局欲改挂英旗。迨回署后，复别有所闻，谓贵局并欲兼挂德

①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16572。按“日本参赞”，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本年五月十五日（6月11日）在北京城永定门外被甘军杀害。

②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72页。

③④⑤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90页。

⑥ 《美德伦充任洋大班合同》、《韦加纳推荐美德伦函》，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一、二十二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60页。

⑦ 查万国公法有“论交战条规”条“人以住处得名，船以船户得名。但借用别国牌照、旗号航海者，即从牌照、旗号得名，自当与该国船只一例看待，无论其船户系局外与否，必就牌照而定其名焉。”参看[美]惠顿《万国公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

⑧ 参看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金立成《招商局售产换旗评议》，中山书社编《近代中国》第4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

旗、美旗云云。窃念敝国与贵国年来友谊日笃敦辑,即现在北匪肇事,敝国义切邻邦,又不复不惜派兵遣舰,以资襄办,以维大局,亦为顾全友谊起见。倘能效其绵助,办理得手,则此后二国国际益当亲切,非他国之可比。二国商务正宜及时格外联络。未知贵局可否将未经挂他国旗之船,改挂敝国旗,以示亲睦。入蒙俯允,即祈赐复,商定一切为荷。端此,并颂时祉。名正肃。六月二十七日。^①

在“东南互保”出台前后上,小田切和盛宣怀一直有着相当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但关于“换旗”问题,盛氏并不愿意节外生枝,遂以事有成议为由,复函敬谢不敏。“顷奉惠函,仰见台端辑睦交谊,维持商务至意,无任感佩。承询商局轮船一事,昨据商董面称,各国商人已于昨日换旗办理。贵国诸商先无来者,所惜尊示稍迟,不克如约,抱歉之至。”^②

这厢刚刚安抚了日本领事,那边预期中即将完成的“换旗”交涉却另生波折。先是,美国领事(John Goodnow, 1858—1907)在促成签署“换旗”协定后,索要为数不菲的酬金,据郑观应禀称“局船转美国旗,官应因上年美领事索重酬,曾询现在之领事如何,据云只要照例衙门费。乃昨日忽着其翻译王松堂问陈董索酬,适萧德在座,遂往询领事。今早据复:连律师费要二千五百两。”。郑观应抱散财消灾的思路,主张“现已转旗,宜早送为宜”。^③此外,德国礼和洋行转述本国外交部训令称“不准其所管之船仍用别国人”,即要求换旗同时换人。这对招商局利益无疑会造成重大损害,原定变换德旗的“利运”、“爱仁”、“公平”三船只好“暂不换旗”,交涉由此陷入僵局。至六月初六日,郑观应通报盛宣怀称:

顷闻德华银行所云,礼拜六折现十万,现因德公使被害,已不准折矣。据陈董云,德人不如英人厚道,恐长江各码头为彼占据,至稳之法,仍拟将本局改为外国公司在香港注册,即英官可以保护。哈华托云,此事在沪可以代办,无须股董赴港,彼可代去等语。各董之意,“公平”亦拟换旗,未悉钧意如何?乞示祇遵。^④

按,当时德国驻京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3—1900)被害的消息已经传播海外,德国政府对华施以强硬姿态,原为招商局拆借现银的德华银行因之终止了业务。招商局董事陈猷以英人较为“厚道”,遂拟议将本局改为外国公司在香港注册,从而寻求保护。无独有偶,值得一提的是,甲午战时郑观应为促成“换洋旗”,也曾经一度起过由股东承买,“在香港政府注册”的念头。^⑤哈华托(William Harwood),英国人,著名律师,其专属事务所(Platt & Co.)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⑥所谓“将本局改为外国公司在香港注册”,换言之,即局船一律改换英旗,招商局方面视此为“至稳之法”,哈华托则可以提供相应的法律帮助。

不过,盛宣怀却有不同的想法。前述婉拒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的理由,由于换德旗未果已告失效,日方继续在施加压力,而正紧锣密鼓进行当中的“互保”换文交涉,盛宣怀仰赖小田切助力之处甚多,故于对外交往时非常注意在日本和欧美国家之间寻求适当平衡。^⑦他对“在香港注册”的建议反映冷淡,相反特别指示招商局负责人,“‘公平’如要换旗,必须换日本旗,固中日之交最要”。郑观应对此抱有异议,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意见:“日人无信,且在沪者均非富商,三井大班之薪水甚薄,恐非稳妥;又闻北京情形,恐日俄开战。”^⑧此后,围绕着三井洋行托管“公平”船,以及是否由正金银行或驻沪领事担保等问题,郑、盛之间往复函商,他们与日本领事小田切也进行过多次接洽。^⑨

(三) 合力推动下实现“换旗”

①② 《小田切万寿之助致盛宣怀函》,1900年6月27日,《盛宣怀复小田切万寿之助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791页。

③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792页。按“陈董”,即陈猷,字辉庭,广东新会人,光绪十七年(1891)后历任上海轮船招商局商董、总董兼会办等职。参见同书第123页。

④⑧⑨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七月初五、初八、初十日,《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792页;第793页;第795、797、799页。

⑤ 郑观应《致招商局盛督办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12页。

⑥ 哈华托曾多次介入发生在租界的重大诉讼案,例如1904年“苏报案”,其人即被清政府聘为原告委托人出庭辩论。参看王敏:《苏报案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7—68页。

⑦ 关于小田切万寿之助与“东南互保”关系的具体论证,详拙文《义和团事变中的日本在华外交官——以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行文至此,再附带讨论一个问题,即马勇先生提出的“换旗”与“来自北方的启示”的关系。《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一文指出,北方开战后,中国政府和民间资本使用了“托管”的办法实行自我保护,并举开滦煤矿矿权纠纷为例说明“托管”利弊所在,进而提出一个假设,即“北方的经验”可能启发了郑观应向主管上司提出相似建议。本文前已说明,郑观应在甲午战时操作局船“换洋旗”的经验及其与洋商、买办的直接交往,是他倾向于“换旗”的触因。而从时序的简单排比来看,最初提出这一建议的时间点在五月廿三日,尚在清廷对外宣战、中外正式决裂之前,故不可能是受“北方的启示”所致。不过,随着战局的持续,“来自北方”的消息确实对“换旗”交涉发生过助推之力。六月十七日(7月13日),郑观应函禀盛宣怀谓“顷据唐守少村云,俄、德、法兵日多,势颇凶,本局长江、宁波、公[开]平等船,宜速换旗,不可延误等语。应以其知京津情形,洋人来意,已嘱趋谒。局船究竟如何?祈即示遵。”^①同日,继“闻开平局船均已换旗”,遂有建议如下:“本局长江各船或不即换,‘江天’、‘公平’可否即换?……是否两船均换日本旗,或正金银行或总领事可保?乞督办饬知。抑应与小田切总领事面商?祈示悉。”^②按招商局与开平矿务局一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后者自购轮船在沿海承运煤炭,其具体业务正是由徐润负责的。^③开平局船率先完成“换旗”,对郑观应来说,确具有一点示范效应。

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是来自上海本地的压力。据郑观应函禀盛宣怀:

顷据密尔登来述,各外国银行会议后,汇丰大班告渠云:商局中栈、北栈、华栈、东栈所存洋货约值银二百余万。如有意外之事,若悬外国旗,可向中国索赔,倘系中国旗,须商局认赔。当此以强为胜之时,尤恐为强国霸占等语。又有五洋商来局云:如不换旗,彼将货出去。因各货多已押在银行,以后各处来船,均不敢泊商局码头起货,所关甚大。伏乞裁示,俾复洋商银行为荷。^④

鉴于时局不靖,在沪各外国银行、洋行为了确保业务照常进行,尽可能降低利益损失,也纷纷要求招商局尽快“换旗”。身当其冲的郑观应迫于上述紧张态势,不得不向上司盛宣怀转嫁压力。

“换旗”交涉随之加快了速度。出于“不宜慕虚名而贾实祸”的现实考虑,经与招商局同事反复商议后,郑观应等提议“长江船宜换英旗,米伦二、耶松一、蔚霞一,‘公平’换日旗,‘江天’仍换英旗”。^⑤从招商局当时的业务状况看,主要有长江、上海—宁波、上海—天津三条航线,走前两条线的局船均换英旗,走上海—天津线的“公平”轮则换日旗,上述主张显然带有一点折中色彩。七月初八日(8月2日),哈华托已经基本拟定了在香港注册的相关章程,(招商局)同事各友闻此办法,均以为妥”。^⑥郑观应本人同时将“昔年译有香港公司律例七册、轮船驾驶章程一册”呈盛宣怀鉴定并请赐序,拟饬商局刊行。^⑦但是,至八月十七日,据郑观应函谓“昨奉手谕,香港注册之议作罢论;长江本局各产是否即照前议,过户与蔚霞及美德伦,仍乞示遵”。^⑧可知前拟章程最终没有得到盛宣怀的批准,未能付诸实行。由于史料缺失,其原因已不得其详。至于最后结果,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可知确有部分招商局轮船换了英旗,而这过程中该局英籍总船主蔚霞出力颇多。至1910年,蔚霞年迈退休时,招商局上报禀请赏给其宝星,还特别表彰称“其于东南保全一役,办理船只换旗保护与二十年分(1894年一笔者注)之事,同一出力,是其于克勤职务中外,尤有成绩较著而不可没者也。”^⑨另再补说一点,日本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换日旗”交涉中发挥了特别作用,其事最终未果,但如果把这个插曲放到“东南互保”期间中日双方密切互动的过程中来考察,则别有意味。小田切与郑观应长期形成的个人交谊也值得一提,戊戌

①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74644。按“唐少川”,即唐绍仪(1862—1938),光绪二十五年三月经前督办津榆铁路大臣许景澄、张翼札委办理山海关内外铁路事务,本年五月义和拳毁路,奉命巡查京津铁路。见林学城编《直东剿匪电存》,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5页。

②④⑤⑦⑧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795页;第798页;第800页;第801页。

③ 张后铨主编《招商局史(近代部分)》,第178页。

⑥ 郑氏自谓“官应因忆甲午之年,曾托律师拟有章程存辉廷处,已嘱是晚或明早觅出交哈华托核定,译呈公订”。《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日,《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799页。

⑨ 《招商局档案》,468②/240,聂宝璋、朱荫贵《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95—1927)》第二辑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807页。按郑观应与蔚霞在处理招商局事务方面,积累了长期矛盾,他也将个人异议编入《盛世危言后编》,公诸于众(参看《致招商局盛督办书》、《致盛督办续论总船主欺朦书》,《郑观应集》下册,第860—86、862—863页),但在甲午、庚子两役“换旗”交涉时,蔚霞仍起到了重要作用,毋庸讳言。

前后两人在沪共建上海亚细亚协会、筹组各种书院,在兴亚、维新等理念上多有契合,郑氏盛赞“小田切君人中杰”,彼此诗歌酬唱之作多已收入《郑观应集》。^①小田切与盛宣怀的交往则更为广泛和密切,在实业、金融、外交诸事务上有着长久的合作关系,光绪三十年(1904)年后者在致小田切的一封去函中表示“十年以来弟常为联络两国之实业、敦厚两邦之交谊起见,不顾微力,开诚布公”,^②言下虽多自许的情态,但仍可借用为两人关系的写照。

二 政治建策的意义与限度:从两件新史料来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盛宣怀在上海分别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明确提出中外互保的办法。^③至迟不晚于次日午前,刘、张已复电允肯,授命上海道余联沅出为与各领事订约,并指令盛宣怀“帮同与议”。^④盛、余合作预拟了有关“东南互保”两个核心文件——《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和《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⑤但是,由于章程中包含了多款限制外国军事行动的条目,在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中外代表正式会议时,各国驻沪领事对此“驳论多端”,均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带有“自我约束”性质的协议。当天中外会议没有形成正式结果。^⑥所以,关于互保章程也就不存在“议定”、“订立”或“正式签署”一说。后来,有关“互保”的交涉其实经历了由“签约”向“换文”的转换,也就是说,不以契约形式将章程法律化,转而通过中外互换照会确立某些和平性质的原则。^⑦

与此同时,郑观应正紧锣密鼓地操作着“换旗”事宜。尚无证据表明,郑观应直接“启发”了盛宣怀倡议“东南互保”,不过,前者还是在第一时间,得知了盛氏奉命草拟保护章程的消息。五月二十九日(6月25日),其致函盛宣怀谓“上海市面惊惶,督办今日所议各节,友人争欲先睹,可否钞示。”^⑧郑观应欲援引“互保”章程款目,目的在平抑商情、保护商利,确如有论者指出,在盛宣怀亲信行列中,其人“主要发挥的是经济方面的作用,而非政治领域”。^⑨函文涉及当时进行中的“会议互保”,而请盛宣怀“钞示”章程条文,亦可侧面证明郑观应本人并未深度介入“互保”交涉进程。及至七月以后,英军登陆上海事件的发生,对形成不久的“互保”局面带来不小的冲击。有将近3000人规模的英国部队开进租界,在当时社会引起新一轮的恐慌,英国领事故而要求地方当局告示声明:他们登陆只是为了防守租界。^⑩站在商人的立场,郑观应对时局仍抱犹疑,坚持贯彻“换旗”的主张。他转述一位轮船主的话说:

今早“江孚”船主云,各领事与东南督抚所定之约,今不可靠。现在长江各省纷纷募兵,兵无纪律。各国兵船日多一日,如有兵匪与外人为难,水师提督随时可以决裂。如一决裂,本局之船不能换旗,正合彼运兵之用等语。^⑪

① 郑观应《赠日本驻沪小田切总领事论时事歌并序》、《答日本小田切总领事论亚细亚协会歌》、《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拟中日在沪共设各种书院》,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305、1313—1314、1317页。

② 《小田切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年七月十六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02701。

③ 《寄李中堂、刘岷帅、张香帅电》(《愚斋存稿》卷三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844页)时间原注五月二十八日,研究著作多据此展开论述。此日期实系误植,查该电韵目为“沁”,发电时间应在五月二十七日。参看《盛京堂来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7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0页;《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8页。日本学者藤冈喜久男最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参氏著《张謇与辛亥革命》,札幌:北海道大学图书馆刊行会,1985年,第97页。

④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京堂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亥刻发,《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29页;《寄余晋珊观察》,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6页。

⑤ 《余道来电并致江宁督署》,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申刻到,《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041页;《盛宣怀致刘坤一电》,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9页。

⑥ 《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ヨリ青木外務大臣宛・秩序維持ニ付各國領事ト協議方劉張兩總督ヘ提議ノ始末並依領事ヨリ兩總督管下ヲ中立トナス提議ニ付請訓ノ件》,明治33年6月25日,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十三卷 別冊一・北清事变上》,东京: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6年,第477—478页。

⑦ 说详拙文《“东南互保”究竟有没有“议定”约款》,《学术月刊》2013年第11期。

⑧⑪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六年七月,《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第790页;第800页。

⑨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591页,注释1。

⑩ 《海军中将西摩尔爵士致海军部电》,1900年8月5日,《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158页。

以郑观应为代表的上海绅商群体,无疑是“东南互保”得以成立的有力支持者。自事变以来,他时刻关注北方局势的变化,不希望战火蔓延及东南,能为清室保存、中国更新留一片干净土,他特别注意在京外国人特别是各国公使的人身安全,即是为将来“收束”提前考虑。^①至于稍后加入中国国会的事实,则更为引人瞩目,实际已带有“相当的政治冒险性”,有论者认为郑观应是“在对内幕有一定程度了解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国会”,但并无证据表明“曾涉足自立军的活动”;也有谓他是“中国国会中比较积极的参与者、组织者”,当时所期待者,在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那么,郑氏政治态度究竟如何?如果将其归入趋新、趋变一路,又“新”至何程度,欲“变”者为何?由于史料不足,讨论郑观应与中国国会的关系存在着困难,马勇先生即认为“这一过程的复原与重建几乎不可能”。不过,笔者还是发现若干史料,与此问题直接相关,或可帮助我们更深一层理解郑氏当时的心态。

其一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札。

敬肃者:顷西报云,德调兵八千来华,已有四千起行;美派兵六千,在小吕宋以备在华之提督调遣;英准调印兵一万七千,今又加炮马队一千六百;昨闻英已允日本兵饷,请其先派兵二万五千入京。翘首北方,必有一场大战,情形不堪设想,东南大帅虽已联络自守疆土,似宜设一公共政府,以期联为一气,为将来与外人讲和地步。未知有当高深否?敬请钧安。官应谨上。十四日。^②

按是函背景,随着北方战事升级,各国政府纷纷调援兵来华,日本政府为实现大规模出兵,展开一系列旨在与欧美列强协调的外交活动,最终英国同意向日本对华增兵提供财政支持。随着第五师团等陆续赴华,日军最高兵数超过20000人,一跃而为为中国战场数量最多的外国军队。^③针对军事紧张的态度,也鉴于北方政府已失信于中外的前提,郑观应建议在“东南互保”基础上更进一步,除了自外于战事,更希望东南督抚联合为一“公共政府”,从而于外交事务有所作为。按本月十一、十二日《中外日报》刊发以《论保东南宜创立国会》为题的“论说”,指出“八国之兵,毁一国之都,而国亡,而政府倒”,国民沦为“无国无主之民”,“故今日策保东南者,不可不自立代政之体,而立国会者此也”,继而主张“七省督抚立公共政府,布设国宪”,“乘此画分南北而图自立,则舍国会之外无有亟于此者”。^④约半个月后,中国国会在上海成立,容闳、严复分任正副会长。据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在七月初四日第二次会议上,除确定会计、书记外,并“定掌干事者十人:郑陶斋、唐拂尘、沈小沂、汪穉卿、汪剑斋、丁叔雅、吴彦复、赵仲宣、胡仲翼、孙仲愚”。^⑤郑观应与汪康年、唐才常等同在干事之列,且为“该团体领导成员中唯一明显具有商人身份的人”。郑观应在盛宣怀幕府中主要发挥的固然是经济方面的作用,然而面临危机之际,往往有出位之思。前揭函文主张“设一公共政府,以期联为一气,为将来与外人讲和地步”,无疑已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而细察中国国会宗旨所在“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⑥两厢并看,实可发现有不少延续与相通处。

其二 郑观应署名致李鸿章陈情书。

庚子事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奉旨内召而迟未动身,至六月二十一日始航海北上,二十五日抵上海,又停留观望近两月,八月二十一日方就道入京,收拾战争残局。^⑦李鸿章此番离粤北上,并未得到俄国以外多数国家的支持,其中尤以英国人反对最力,故于入沪后受到尴尬的冷遇。^⑧这在郑观应致盛宣怀的禀函中可以得到旁证“顷阅粤局来电,傅相有小队约百余人至二百人,廿一日由‘富顺’来沪。

①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二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74638-1;《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三十日,《义和团运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第89页。

② 《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四日,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63942。

③ [日]斋藤聖二《北清事变と日本軍》,东京:芙蓉書房,2006年,第46—48页。

④ 转引自李守孔《唐才常与自立军》,《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二编·戊戌变法》,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13—614页。

⑤⑥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13页。

⑦ 雷禄庆编《李鸿章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23—631页。

⑧ [日]久保田善丈《李鸿章北上をめぐる諸対応——清末中国の中央地方関係とイギリスの対中政策》,《史潮》通号33—34,1993年11月。

请督办即电咨傅相, 询准英领事方可来, 因“富顺”挂英旗, 且租界向例, 不能驻华兵云。”^①六月二十七日, 也就是李鸿章到沪后第三日, 郑观应、汪康年等沪上维新名士十四人联署陈情书, 其文云:

……此所以欲安社稷, 必须速缓客兵, 欲缓客兵, 即在自剿土匪。近尝采诸各国舆论, 咸以此乱事倘由中国自行剿平, 则交涉各事, 当可和平办理云云。可见我若能自行将土匪速行剿洗, 未始不可望大局转机。……惟是今日之团匪, 非用痛剿一策, 更无翰法, 非勋高望重、应膺艰巨为中堂, 不能周知利害。拟请会商各督抚, 速行遴派劲兵, 协筹饷项, 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 率以北上。一面将津京团匪痛行剿洗, 其有助匪为乱之将弁, 一律诛戮; 一面即电致各国, 劝其不必续行派兵, 以免猜嫌。并告以痛剿团匪之举, 即与各国和好甚敦之证, 团匪荡平之日, 即与各公使坛站甚集之时。庶东西洋观所既展, 而大局始有转机。

惟某等尚有虑者, 现在匪党遍布宫禁城廂, 内外半系乱兵, 万一西师猝入, 彼党计穷, 与二三贼臣谋拥两宫西走山陕, 则大局愈不可为。若能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又稍习京朝情形者, 令统一大队, 驻守西道, 以防贼众狡谋, 亦一要着。……总之朝命不当违, 而非出自两宫之圣裁, 则不得视为朝命; 臣节不可亏, 而不奉贼臣之矫诏, 则不谓有亏臣节。以中堂之公忠体国, 必能以国事为甚, 生死利害犹不遑计, 岂有慎此疑似之小节乎?^②

此类以上位者为目标, 策画甚或直接实施带有强烈政治味道的建言, 对郑观应来说, 并非第一次。近有学者重新检讨郑观应与甲午年(1894)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幕后关系及其在兴中会早期历史中的地位, 指出“郑观应绝非普通商人”, 个性为人中具有“好奇计”、“对军事冒险活动极有兴趣”的特质。^③郑观应的思想构成向称驳杂, 其对自身政治理念的表述亦经屡次改写, 并非可以一时一地衡之。欲对他的言论有所理解与评估, 较佳的途径仍应是尽量放回到“语境”中来作观察。前揭联名陈情书, 上达时间在中国国会成立后, 其中请“自剿土匪”、劝各国“不必续行派兵”, 以及防止“二三贼臣”挟持两宫西迁等建策, 均延续了事变以来郑观应一贯的思路。其立场在于反对义和团、排斥北方政府, 或主张拥光绪帝复辟, 或依赖南方督抚自组政府, 但存续清室仍然为不容质疑的前提。易惠莉先已指出, 尽管郑观应不乏民权等近代观念, 但在当时传统意识仍然起着主宰作用, 尤其在“忠孝”观念上毫无离经叛道之意。^④在郑观应因应时局的总体考虑中, “迎辟”或曰“勤王”是最核心的内容。而这其实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绅共享的观念。检索当时海内舆论, 对“东南互保”毁誉参半, 誉之者姑且不论, 毁之者, 一则称不遵朝命, 斥为海外叛臣, 一则称坐视叛逆挟制朝廷, 而不声罪致讨, 斥为雌伏东南作壁上观。^⑤前者与站在正统立场发言的清流辞气遥相呼应, 均以“君父战于西北, 臣子和于东南”之类所谓“市恩夷狄”的行为而不齿, 斥其“保护则昼夜勤劳, 勤王则疲癯应命, 但为护夷之文告, 保教之条约, 议论荒谬, 骇人听闻”、“弃宗社于度外, 委君父于死地, 臣节之亏大矣”。^⑥此类批评大致同属保清一线, 尚不构成舆论的主流。更值得注意的, 是后一种严厉的批评。如《中外日报》事后尝检讨“东南安宴之非”, 仍坚持称“东南督抚为一时权宜之计, 与外人立约互保, 以保境宁人”只不过是保守自利的做法, “为一方计可也, 为全局计不可也, 为一时计可也, 为长久计不可也”。^⑦事实上, 这种批评恰是以承认“东南互保”为前提的, 鲜明反对排外, 视义和团为“匪类”, 其锋芒所向直指满洲权贵主持的北方政府, 其不满者, 恰在于主持“互保”的地方督抚督抚“徒恃成约”而图苟安, 不欲或不敢剿拳匪、劾政府、拥光绪复辟。六月十四日, 《中外日报》发文, 公然指出“拳匪之扰也, 互保之立约也, 中国不能不南北分疆,

① 《郑官应致盛宣怀函》,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 第796页。

② 《上海通信·上海维新党中重なる人士の李鴻章伯に呈したる意見書(1900年7月23日)》, 《東亞同文會第十回報告》, 明治33年9月1日,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译文并可参看廖梅《汪康年: 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第275—276页, 注释73。

③ 陈晓平《郑观应创立了兴中会》, 《南方周末》2014年1月24日。

④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 第596—597页。

⑤ 王尔敏《拳变时期的南省互保》,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文集13·庚子拳乱》, 第166—167页。

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873—874、877—878页。

⑦ 《论东南安宴之非》, 《中外日报》1900年11月30日,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 第215—216页。

而离立乃自然之势，亦必然之理也。惟是欲固南疆必先外纾党禁，内集民守，公布新政，而后可图自立之有基。然不乘此东西大兵尚未云集之时，提劲旅以北援，而外助邻战，内讨国贼，则亦未能树独立之义声，此固南亦当以援北为先。”^①十六日，又发文，表示“盖今日之事，为创局，非因局，是变例，非正例，只有非有绝大布置，非常权变，则不足保太平，御奇祸，而所谓保境恤民者，亦几成虚语矣”，又申明“一定政策”，“既曰勤王，便实宜尊王，名为讨逆，方不至从逆，此方睦邻，则不得攻，明其剿匪，必不许助匪”。^②以上论说，都要求东南省份独立于北方而自立，其内涵并还包括北上剿匪，迎銮南下，不过，如廖梅所指出，“以《中外日报》为代表的东南士绅眼中，这只是一种非常局势下的权变，其内心仍无法摆脱与北方和光绪帝的联系。而且论说只谈南方，不论北方”。^③除了言论表现，上述观念也落实于行动。关于郑、汪等联名陈情的结果，据汪康年对预闻其事的日本人井上雅二事后透露，“李鸿章对我们通过郑观应提出的条件与形势对策尚未予答复。同时叱责郑观应不该说出那样的话。看来李鸿章几乎没有打算，实际上似要按照西太后的回电才能作出决定。”^④可见，联署与呈递陈情书前后，郑观应发挥了主要作用，并且是与李鸿章直接沟通的重要一环，惜其说未见采用。

三 余 论

戊戌政变发生后，清廷对新党实行雷厉风行的清算，继而掀起以废立为阴谋的建储风波，这一系列举动无疑阻碍了曾寄望中央改革的趋新人士再建信心。北京政府近于倒行逆施的形象，也严重戕损自身合法性基础，将越来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利用通商口岸便利的舆论条件，南方推出新的民意代表，新/旧、满/汉、南/北、保守/改良这些畛域的分野日益被重视和宣讲。及庚子事变骤起，又有大批新学士人避乱南下，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区域隐然为维新运动的一大策源地。为数不少的江浙沪地方士绅直接参与了“东南互保”的酝酿与策画过程，这批人物或者为督抚参谋的幕僚，或为地位相对超脱的绅商，但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某种趋新取向，多数人在后来列名中国国会，如果将他们大致归类为新党，似不能算误。杨国强先生以冷峻的史家笔触写道“庚子年间长江流域的‘东南互保’虽然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而由此形成的南方颀颀北地，则显然地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与分野。”^⑤郑观应是其中并不显山露水，但所作所为富于实际成效的一员。事后，盛宣怀向朝廷奏请奖励义和团事变期间“在沪出力华洋官绅”，郑观应之名赫然在列，其获赞辞云“于庚子拳匪之乱咸以保护东南、维持大局为心，虽身居局外，而岌岌焉若不遑终日，其明大义、识大体，视国事如家事，有为人所不能及者。”^⑥如盛宣怀所言“身居局外”，郑观应并未直接参与“东南互保”的筹谋进程，但以商人的冷静和理性，着眼于“不宜慕虚名而贾实祸”的现实考虑，慎密操作了招商局轮船的“换旗”交涉；同时，作为寓沪粤籍绅商的代表，参与了针对被困于京津地区东南士人的整个救援组织工作，利用国内外关系网“为庚子救援行动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⑦当义和团事变高潮之际，郑观应又有若干出位之思，从政治的考量出发，向上位者就“互保”局面的巩固和进一步发展多有建言，而组织与加入中国国会的行动则已带

① 《固南援北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六日，路遥主编《义和团文件资料汇编·中文卷（上）》，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69页。

② 《筹南十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二十四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189—192页。

③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58页。必须指出的，这也只是庚子事变时期东南地方士绅因应时局的思路之一，如果循着由“言”及“行”的方式，细考时人（即使为趋新一面）的“政治观”，所映射在同一光谱上的色彩异常驳杂。如张謇、陈三立、汤寿潜等人谋“题外作文、度外举事”，策动东南督抚“迎銮南下”，与“东南互保”系同一时期产物，但其性质已入“勤王”运动范围，可算是戊戌政变以后帝、后党争之余绪；汪康年、陶森甲等号称“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也通过游说地方权力人物，为南方自建“联邦”试探道路，则其背后或隐或显已有外国势力的推手；至于唐才常派在行动方略上主联络会党武装勤王，已为士绅名流所难梦见。相关初步讨论，可参看拙文《“题外作文、度外举事”与“借资鄂帅”背后——陈三立与梁鼎芬庚子密札补证》，《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④ 《井上雅二日记——唐才常自立军起义》，郑大华译，薛军力校，《近代史资料》（总7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6页。

⑤ 杨国强《1900年：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载氏著《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17页。

⑥ 盛宣怀《义和团时期在沪出力华洋官绅职名折》，光绪二十六年，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号057611。

⑦ 参看冯志阳《粤籍绅商与庚子救援——以上海广肇会所为中心的考察》，未刊论文，“对外开放与上海城市发展”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海，2014年2月。

有一定的政治冒险性。

此处想稍作申论是,东南督抚和维新士人在“互保”一点上达成暂时的共识,但在后者应对时局的设想中,“互保”也仅是一折衷手段,或曰阶段性方案,甚而在趋新的士绅群体内部,对政局的总体判断及应变的目标设定也各有分野。中国国会基本上可视作当时背景各异而总体趋新的各派人士的一次集结,地方督抚起初也持不置可否的默认态度,但两者之间实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国会内部,因近似目的而合作的各类群体,思想往往呈现发展不同步的状况,虽以“勤王”为旗号示外,实则充斥观念的歧异和竞争。激进如章太炎者,在义和团事起之初,尚曾经上书李鸿章,批评东南督抚在列强与政府之间选择中立为“齟齬为两可之谋”,鼓励“明绝伪诏、更建政府”、“示列强以藩镇之可恃”;至中国国会成立,“割辫与绝”,正式选择排满的道路;自立会事败后,又写出《分镇匡谬》,对“借权之谋”痛下针砭,反省当初寄希望于地方督抚的错误,把其一概划入满清反动阵营。^①短短不到半年,心态如此急遽转折,可见东南督抚在维新士人心中地位的前后落差。回到郑观应本人,在反义和拳、反排外、反北方政府诸问题上,他均有充分自觉意识,对于变政维新的前景也抱有强烈愿望,但其存续清室、忠君爱国的观念则不容轻易动摇,这也可以说是他固守的一条底线。章太炎在庚子年慨叹“海上党锢,欲建国会。然所执不同,与日本尊攘异矣。或欲迎蹕,或欲□□(排满),斯固水火。就迎蹕言,信国(文廷式)欲借力东西(日本、欧美列强),铸万(唐才常)欲翁(翁同龢、陈宝箴)坐镇,梁公(狄葆贤)欲密召昆仑(康有为),文言(汪康年)欲借资鄂帅(张之洞)。志士既少,离心复甚,事可知也。”^②由前揭郑观应与汪康年联署致李鸿章陈情书可知,郑氏大概可归入“迎蹕”一派,他参与中国国会,即出于对“勤王”旗帜的认同,包括事变期间建议东南督抚设“公共政府”,陈请北上剿团匪、护两宫等等,皆与此种心态相关。至八国联军入京、宫廷西逃后,郑观应作《拳匪》诗,仍有句云“北望泪沾巾,烽烟何日止。车驾盼东还,新政从此始。”^③本年间,郑氏改定八卷本《盛世危言》,将原有“议院”上、下篇的位置更加以突出,在“议院下”篇后补写了几近于原文长短的附言,又增订“原君”与“自强论”两篇。^④关于郑观应的政治思想,研究者围绕《盛世危言》的文本讨论已夥,尤其就其“议会”思想多所发挥,公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易惠莉并且指出,君主立宪政体的提出,可视作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摆脱传统政治理想框架的一个迹象,郑观应正是“借助于1900年与1901年弥漫于维新界的激愤悲观情绪”,完成了这一摆脱。^⑤新近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在检讨近代思想史研究中“文献”与“语境”关系时,亦举郑观应的“议会”思想为例,提示其多次改写背后的现实政治因素,而庚子年“议院”等篇的补写与增订,可能意味着——“对义和团事变漩涡中萧条的政治状况的绝望与期待”。^⑥光绪二十五年,也即戊戌政变后次年,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长宗方小太郎(1864—1923)在上海与郑观应第一次见面,他记述了当时场景,在这位雄心勃勃的“大陆浪人”眼中,“郑观应其人固不乏识见,而无自奋气象,非有为之器也”。^⑦值庚子事变之际,面对豪杰蜂起、中枢既倒的前景,有着“维新思想家”与“买办商人”双重标签的郑观应的政治选择与实际行动,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志士”与“改革家”提供的诸多选择项中颇具有参照意义,它所蕴含的历史纵深的丰富信息,不仅为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言说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线索,也为反思既有历史叙事中新旧对垒、此长彼消的单调认知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责任编辑 孔令琴)

① 参看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07—111页。

② 章太炎《再致夏曾佑》(一九〇〇年),朱维铮、姜义华选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15—116页。关于引文中隐语的说明,并参考了朱维铮《〈馥书〉发微》,载氏著《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9页,注12。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第1364页。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311—318、331—339页。

⑤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第614页。

⑥ [日]岡本隆司、吉澤誠一郎編《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年,第215页。

⑦ 宗方小太郎日记,明治三十二年五月三十日,稿本,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藏。

“*Rendao Zhuyi*” and “*Renwen Zhuyi*”: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erm “Humanism”

(by LAI Hui-liang)

Abstract: In the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humanism in 1980s and thereafter,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opinions pertaining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erm “humanism”: some suggest *Rendao Zhuyi*, some *Renwen Zhuyi*, and the others *Rendao Zhuyi* or *Renwen Zhuyi*. In fact, since the term “humanism” in Western languages has various meanings, it should be translated into different Chinese expressions proper to specific contexts.

Keywords: *Rendao Zhuyi* in the narrow sense, *Rendao Zhuyi* in the broad sense, *Renwen Zhuyi*

“Home”, “Nation”, “Manchu” and “Han”: On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and the Big Compromise in 1912

(by SHEN Jie)

Abstract: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and the Big Compromise in 1912 was a dramatic change in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not only because it re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monarchy to a republic, but also because the compromise, to some extent, updated the “shifts of dynasties”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n China's political history, revolutions had been always cruel, in which “emperors died for the nation; officials died for the territory; literati died for the institutions”. “Death” had become a political protocol. However, in 1912, they decided to compromise: the emperor rather granted the nation to the common people than died for it; it was unnecessary for officials and literati to die for the emperor since they embraced the new institutions of the “republic”. In various entanglements of home, nation and ethnical groups, the “adhesion to the feudalism” lost its rationality and value foundation, while it was an appropriate choice to “compromise”. Western revolutions and modern transitions were usually achieved in the spirit of contract. This kind of compromises guided by the contract spirit is rare in China's traditional politics. Therefore, if we regard the compromise as a principle of the parliament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 Big Compromise in 1912 has more specific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that it at least terminated formally the imperialistic politics and culture and initiat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politics.

Keywords: the abdication of the Qing Emperor, anti-Manchu,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FENG Jing-ru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Vortex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ZOU Zhen-huan)

Abstract: FENG Jing-ru escaped to Japan in his early age due to his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Red Turban Rebellion. He ran Wenjing Shop in Yamashitacho, Yokohama, which engaged in selling foreign stationery and print production. FENG treated SUN Yat-sen warmly when SUN went to Yokohama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uangzhou Uprising in 1895. Soon after, China Revival Society was established on the second floor in Wenjing Shop and FENG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Yokohama Sub-association of China Revival Society. He often sponsored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in Japan afterwards. In 1898, FENG founded Datong School, the first Chinese school in Japan. In 1901, Wenjing Shop caught a fire. In the same year, FENG became the nominal general manager of Guangzhi Book Company in Shanghai. He promoted the new publishing business with his own social status and influence. I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vortex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ENG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areer.

Keywords: FENG Jing-ru, China Revival Society, Datong School in Yokohama, Guangzhi Book Company,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A New Study on ZHENG Guan-ying in the “Mutual Protection of Southeast China” Period

(by DAI Hai-bin)

Abstract: With the consideration that “one should be suffered from a real disaster resulted from the pursuit of a vain fame”, ZHENG Guan-ying secretly and carefully conducted the “Flag Changing” activity on the ship of China Merchants Steamship Company with a businessman's calmness and reason. With political con-

sideration , he also provided lots of advices concerning strength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Mutual Protection of Southeast China” from the political perspective. He participated in Chinese Parliament. With the acceptance of “being dutiful to the throne” , he consciously opposed Boxer Movement , exclusivity and the Northern Government. On the other hand , he had strong desire about the prospect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and carried it into practice by submitting petitions. The profound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mplied in these facts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clues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the relation between his words and his time , but also provides us with excellent material to rethink the monotone paradigm in the extant historical narrations which holds the sharp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Keywords: ZHENG Guan-ying , SHENG Xuan-huai , the Mutual Protection of Southeast China , Chinese Parliament

On the Dilemma of Choosing a Successor in Shakyamuni’ s Later Years as well as Its Result (by XIA Jin-hua)

Abstract: In his old age , the issue of choosing a successor became a key flash point that ignited a seri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flicts and problems in the sangha. The issue was not only constrained by the conflicts between Shakya monks and Brahman monks , but also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truggle between Buddhism and Jainism. The Buddha was in a dilemma and failed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The fact that the records in sutras seem to avoid this issue intentionally makes the issue particularly perplexing and complicated. This paper makes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by analyzing carefully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texts. It aims to reveal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ancient Buddhist circle in India and to put forward the author’ s own opinion.

Keywords: Shakyamuni , Sariputra , Maudgalyayana , Devadatta , Mahakassapa , Ananda

On the Religious Implications of Laozi’ s *Dao* (by AN Lun)

Abstract: As the core of *Dao De Jing* , the *Dao* is the mostly discussed topic which has caused most dispute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idea of *Dao De Jing* , the metaphysical *Dao* , as the origin of all things in the universe , is effortless and spontaneous , weak and far from having intention for struggle , and ready for turning to the opposite. The *Dao* for human conduct , the *Dao* for administration , and the *Dao* of the sage—all of these advocated by Laozi are worldly principle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the metaphysical *Dao*.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he metaphysical *Dao* , including having no image , no sound and no substance , being ineffable , existing for itself and being eternally , make the *Dao* similar to the supreme God or the Creator in other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Keywords: *Dao De Jing* , Laozi , the *Dao* , the supreme God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Debate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ergsonism and Buddhism around 1921 (by YAO Bin-bin)

Abstract: When Bergsonism was widely spread in China’ academic circle around 1921 , the debate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Bergsonism and Buddhism appeared and ZHANG Tai-yan , LV Cheng , LIANG Shu-ming , LI Jin-xi and other scholars took part in this debate successively. Zhang and Li argued that Bergsonism and Buddhism we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 believing that the categories such as “intuition” and “vital impetus” conform to Alaya-consciousness and other concepts in the doctrine of Mere-consciousness. Lv and Liang held an opposite opinion.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original materials ,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whole course of this debate and argues that these two opposite opinions represent typical attitudes towar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past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Keywords: intuitionism , vital impetus , the doctrine of Mere-consciousness , alaya-vijnana

Debt Scale , Asset Value and Debt Risk of Local Government (by PAN Zhi-bin)

Abstract: Using the Contingent Claims Approach (CCA) , this paper measures debt risk of 31 Chinese